

馆老干部处与善本部共同举办座谈会回忆名家手稿入藏盛举

黄 霞 整理

王佩瑶（离退休老干部处处长）：

今天我们把几位老前辈请来，大家一起谈谈有关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库建库历史的情况。最近善本部准备办一个有关名家手稿的展览，他们在筹办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当事人退休了，藏品来源又缺乏相关的资料记载，致使一些藏品入藏本馆的历史情况说不清楚。另外，不久前冀淑英先生过世了，这也留下许多遗憾。冀先生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心愿，要把她所知道的馆藏善本书的来历、背景以及一些历史掌故等写下来，传给后人。这件事原已在计划之中，可事情还没来得及做，先生就故去了，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不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馆里很重视善本部的工作，善本部的同志也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大家也看到了，陈馆长今天亲自到会，表示支持善本部做这项工作。

善本部出了一本《文津流觞》，这个通讯办得很好，我觉得征求名家手稿这件事无论是对在座的老同志还是对于年轻的后辈，都是应该全力去做的。这项工作今后还得以善本部的同志为主，如果需要我们离退休干部处出面，请各位老前辈出山的时候，也希望老同志们象平时所说的那样“多发一份光，多发一份热”，把自己所知道的记载下来，登在这个刊物上，传给后辈。我相信后辈们也会把这种精神、这种做法发扬光大的。

陈力（副馆长）：

首先我要对各位老同志今天能够到会表示感谢！同时也祝各位老同志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是今年2月底到馆里来工作的，在国家图书馆是个新兵，很多地方要向各位老前辈请教。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想听听各位老前辈对我们馆名人手稿征集、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因为名人手稿对国家图书馆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全世界各国的国家图书馆，都是把征集本国的名家手稿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我馆从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我馆名人手稿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在座的各位前辈、还有今天没有到会的以及已经去世的老同志们辛勤努力的结果。以前在长期的工作中，各位老前辈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了解很多情况，所以这项工作怎样开展，想听听老前辈们的意见。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中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名人手稿的征集上，最近，张元济先生的一批手稿也入藏我馆，是他的一个亲戚收藏的，装裱得很好，上周五刚刚拿回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最近，我们也准备有目的的征集一些名人手稿，馆长们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后还向任馆长作了汇报，任馆长非常赞同善本部的想法，并且他特别提到名人手稿的工作要抓紧进行。任馆长明确指示，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征集手稿、信函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请各位前辈来提些意见和建议。

张志清（善本部主任）：

我简单介绍一下展览的情况。善本部计划用两个月在善本阅览室举办一次“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珍藏展览”，这个展览为的是配合今年开展名家手稿征集活动。具体想法是想以这次展览为契机作一个宣传活动，号召社会各界向我们捐赠手稿。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遇到一点困难，主要是不太清楚有些手稿的来源、收藏的掌故，如果想让展览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使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这些来源、掌故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今天把各位前辈请来，主要是想请各位谈谈这个方面的情况。刚才会前发给各位的三份材料，一份是《名家手稿展览目录》，一份是《新闻稿》，还

有一份是《名家手稿文库征集办法》。这个《征集办法》善本部的几位同志事先作了一下讨论，是初步方案，是否可行？今后在这个方面还应该怎样做？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教。

丁瑜（善本部研究馆员）：

刚才听三位领导发言，对这个设想非常赞成，也感觉到善本部这样做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大事。善本部征集手稿，起源很早，大概始于1952年，到56年向科学进军，是个高潮。57年反右，受点影响，到文革时停顿了一个时期。文革时期也有那时的特点，人们对毛主席著作非常尊崇，因此，徐自强同志又发起征集毛主席的手稿。

从征集手稿的过程来说，第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冯宝琳同志。她对手稿征集做的工作最多，而且这项工作也是由她开始的。当时对一些领导人的手稿，如毛主席致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他名家的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还有巴金、吴晗的手稿，冯宝琳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文革开始以后，徐自强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联系高亨家、叶恭绰家、章士钊家，也征集了很多稿子。毛主席的手稿后来中央要统一管理，都交了上去。交出去之前做复制工作，徐自强负责与出版社联系。当时只有几个老同志，每天都在那儿盯着，连新疆出土的卜天寿书写的《论语》手稿，也是那时一起复制的。后来主要是善本组的刘东钦、赵洁敏、刘毅她们几位管手稿和新善本的同志做了大量保护方面的工作。

刘东钦（善本部馆员）：

我做革命文献资料方面的工作多，手稿方面，冯宝琳先生负责征集、编目，了解情况最多。从接触革命者、名家，都更直接一些，她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写过文章介绍了征集过程，另外她本人也向我们口头讲述过一些情况，今天她没有来，很遗憾。具体管理手稿的，还有孙笑堃、林小安等人。文革期间，善本组的一些同志一起编过手稿的复印件，如鲁迅的照片，当时由冀先生统一负责把质量关。

目前搞这个展览，意义很大，也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向社会宣传，希望各界提供线索，或者亲自捐赠，我们都非常欢迎。80年代，我们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文章，向社会呼吁将革命文献及手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在馆里也写过文章、进行过广播，希望同志们有发现、了解情况的，向我们提供线索。

名家手稿有特殊性，除了著名的革命家之外，还有作家和其他名人的手稿。我馆所藏名家手稿在国内应该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曾藏过毛主席的手稿，后来上级下了调令，上交中央。我们有过一段收藏这部分内容的一个好的历史，可骄傲地说，我们馆藏的这部分东西比较丰富、比较全面，可以说是“丰富、精彩、珍贵”。过去有愿望，想宣传，没有时机也没有条件。现在有好的形势、氛围，各方面条件也允许，也适宜。过去是由馆里统一来做，现在由我们善本部自己来做这项工作，我觉得意义很深远。现在有很多人来国家图书馆看书，如果通过这么一个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一部分丰富的馆藏，这样的宣传，一定会对手稿的征集起到推动作用。

徐自强（原善本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关于名家手稿，了解情况的最老的同志有几人，一个是冯宝琳，一个是丁公，还有一个是孙笑堃。毛主席的手稿，原件都已经收回去了。我们馆收集到毛主席的手稿有二、三十件，上交中央以后，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我们都保留了珂罗版影印件，当时只印了三份：中央一份、家属本人一份、我馆一份。当时中央要收回毛主席的手稿，我们要求留些东西，后来由中央档案馆出资，以珂罗版技术原件原样影印。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有批示。章士钊是很有影响的人，他本人原是教育部的，毛主席与他交往很早，他一家从他本人到他女婿乔冠华，都很有名，他支持毛主席勤工俭学，由教育部拨款。

再有就是陈垣的东西，他的书有4万册，及一批手稿书稿，里面可能还有他的批语、批件，有的书中可能夹着小条。陈垣是党员、北师大校长，1976年去世，我去北师大办的接收。他有遗嘱：书全部归国家；存款全部上交党费。当时为了他的这批书，还与北师大的军管会“打官司”，北图说现在能够代表国家的只有国家图书馆。陈垣的藏书及手稿现在大部分收藏在本馆。

再有就是郑振铎的书，最了解情况的是冀淑英先生。郑振铎的10万册书中，尤其是戏曲部分中，他的批件、批语不少，画圈画点的。其中还有不少他的手稿。

王玉良（原善本组组长、副研究馆员）：

我接触手稿是在七十年代。文革中批判“封资修”，古籍善本工作处于停顿。善本组的工作，以手稿为第一位，因为当中有革命文献，不光是“封资修”的东西。以前主要是冯宝琳先生征集，她有二、三篇文章介绍情况。当时孙笑堃、杨殿甲等先生都参加过整理工作。到了七十年代，善本组全体人员参加整理，重新编目，每号的详细页数、张数都有记录，形成了后来的目录。当时手稿是特藏，在手稿室有专人负责，我主要负责采访。文革时手稿室由丁瑜、林小安二位同志负责，后来刘毅、刘东钦他们负责。手稿目录部分我熟悉一些（注：手稿卡片目录由王玉良先生誊抄）。

征集手稿时，得到巴金先生的协助最多，目录后边都有记载。还有不少手稿从《新观察》编辑部转来，其中作家、文学家的手稿居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手稿都是个别、分别来的。后来又陆续有些征集工作，都是有目标的，报上也登过一些征集启事，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工作。

陈垣藏书的情况，我还有些印象。田印宝他们将有他手写的东西全都选了出来，包括代抄的那些资料，也都在手稿库中，归入善本组，其他书归在普通古籍。

徐自强

我们本馆专家的手稿要注意收集保存。比如赵万里先生，善本部应该有他的信件、资料。

借此多说几句，我们图书馆界连最有名的赵万里先生，也没有出版论文集。善本部年轻些的同志都起来了，能否把冀淑英、赵万里、陈恩惠先生的论文以善本部的名义编一本，一个人一本，这是对他们的纪念，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他们的文章水平很高，现在看来，我们要想写到他们的水平，也还很难。赵万里先生的水平也很高，宿白的文章也还没人能超过，你们最好想办法编一下，正好陈馆长也在这儿，要是能把这件事做一下，与手稿展览一样，也是一件大好事。有困难我们可以一块想办法（不论是文章上的、经济上的困难）。编这些稿子，对你们也是一个提高，这是顺便的一个建议。

说到手稿，还有几个人要注意。

梁启超的东西1929年寄存在我们馆。梁启超是近代史上很有名的文化人物，我们应该把他的东西归整一下。现在他的铜像在我们馆，他的办公桌、他写字的笔、砚台、印章以及碑帖拓本都在我们馆，如果能让金石组或其他人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能完整的保存一个“梁启超工作室”。他既是我们的老馆长，又是变法维新人物，现在他的东西分散在各处，很可惜。他的铜像差点就进造铜厂了，当时我们得知消息，赶快收回来，陈列在分馆。他的大桌子，在文革期间已经到了报库，快要流出去了，以后我们想了好多办法，用别的东西把它换回来留下来，现在分馆馆史陈列室，这是很重要的文物，这个办公桌恐怕全馆也就只此一张，它的规模、质量、气派都不一般，这也是现在很

多人想办法炒作文物的原因。我说我们馆有这么几件，有些人非常羡慕。我们是否应该提高它的保存规格，因为以后不会有，康、梁的东西就这么一份了。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黎锦熙，他是毛主席的两位老师之一，他的东西完整的在我们这。以前他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是捐给历史博物馆了，厉博原先也答应给他整理目录，给他办展览。可拿去以后就封在架子上了，一封就是多少年，直到他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盲人，在首师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很贫困。他女儿就找到我们，将东西给了我们，我们给了她奖金，因为她生活很困难。这批东西中有他的著作手稿：关于中国的汉字简化、语言文字等等。

王玉良：

罗振玉的东西罗福贻（罗振玉的第4子）收藏了一些，手书之类都转到罗继祖处了。我们馆收藏的东西，如罗振玉给王国维的信，都是王国维的后人捐赠的。

丁瑜：

罗振玉、王国维之外，傅增湘也应该算一个。他的版本目录的著作，有几百万字。另外，他的砚台、办公桌、笔筒等全套文具，都捐赠给了善本部。

徐自强：

他的后人傅熹年可以访问一下。傅增湘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很大。现在傅熹年手中可能还有不少东西，他是搞书画、建筑、文史的，本人又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是中科院院士。

另外，建新馆的吴亮勇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最近刚刚荣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是建新馆的五老之一，他对新馆建设有很大贡献，他的手迹有内容，我们可一块儿去他那里看看。

丁瑜：

展览中应再补充两个人物，王重民和孙楷第。这两位一个研究小说史，一个研究敦煌，王重民解放初期还是代理馆长。

薛殿玺（原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

现在社会上对手稿这类东西普遍开始重视，因此收集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点“绝招”，恐怕就要有点困难了。比如说文学艺术方面，现代文学馆会收走，而且现代文学馆比我们这边顺，因为他们是专门搞这方面的，有号召力，我们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以前好得多，应该拿出一点房子来，把各家专藏文库建立起来。郑振铎的文库太大，可以单辟。某些名人的专藏，可用专柜形式。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上门去动员人家捐出自己的东西时，这就是一张王牌，我们国家图书馆将为你建立专柜、专库，一是你的东西可以流芳百世，二来也可以提供各界使用，这就比较方便。我觉得这样做是手稿征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招牌，在这儿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不知合不合适。

2001年7月3日